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文革“斗争会”（一）	王友琴
【运动记愧】	我的忏悔	杨 健
【亡灵祭坛】	为人权被处决的张九能	傅国涌
【当事者言】	我见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	徐景贤
【史实辨析】	林彪“逃席事件”的真与假	马双有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报告】

文革“斗争会”（一）

• 王友琴 •

一、前言：题目和方法

“斗争会”是文革的主要景观之一，也是文革的最邪恶的一道风景线。

文革中，除了婴幼儿，没有人没有参加过“斗争会”，包括小学生在内。在所有的工作单位和行政区域，没有地方没有举行过“斗争会”，包括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偏僻的边境地区在内。文革中废除了升学考试，大学五年没有上课，中学有两年左右没有上过文化课，小学也长期不上课或者半上课。文化单位都不工作（因为他们原来从事的工作都成为了文革的对象）。行政机构都实行“军管”（军事管制），大量干部停止日常工作。大量时间用在了“斗争会”上。

文革期间，特别是文革的前四年（1966—1970），“斗争会”开得既多又密。这些“斗争会”可能大小各异，但是都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和进行程序。“斗争会”设立了一套特别的身体折磨，如“坐喷气式飞机”。有人在“斗争会”上被打死，有人被“斗争”得肢体残废或者精神失常，有人在被“斗争”后“自杀”（这里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完全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自杀）。而那些“斗争”别人的人，有的是踏着受害者在权力之路上爬升，有的是出于恐惧而附和权势者迫害他人。“斗争会”不但杀人伤人，而且导致道德腐败。

文革的主要口号之一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牛鬼蛇神”人数众多，而且都曾在“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可以说，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斗争会”来开展和实行的。“斗争会”是文革中系统性地使用的形式。文革中用来打击“革命对象”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大字报”“揭发”，比如用“牛棚”（设立在各工作单位的监狱）监禁，比如逮捕和死刑，但是“斗争会”无疑是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同时，也因为这是“会”，即有很多人在场，不但目睹而且参与，所以在人群中有更大的影响。“斗争会”在中国虽然并非自文革开始，但是在文革中

成长为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强壮而活跃的新型器官。

在中国历史上和现代世界上，“斗争会”非常独特。“斗争会”并非中国古代传统，“斗争”一词原来被理解为双方互相争斗，而不是指一方欺侮攻击虐待惩罚另一方。“斗争会”也不是从外国传入。在意识形态相同和发生过同样大规模迫害的斯大林苏联，未见使用过这一形式。一般英语读者看到“Struggle Session”（“斗争会”英译）则茫然不知其意，因为他们的经验中并无此事。

“斗争会”在文革中的规模和影响以及其独特性，有理由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文革研究对象。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未见到对于“斗争会”的专题研究。首要原因应该是文革后的当局不允许进行文革历史研究。其次，因“斗争会”太普遍而习以为常不加深思也是原因。而更应使人警觉的是，文革实际上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看待和评价历史的价值标准。迫害可能被合理化，或者像天气冷暖变化一样被人接受了，所以“斗争会”也就不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

本文对“斗争会”案例进行分析和归纳，并分析“斗争会”怎样达到其把“斗争”对象“斗倒斗垮斗臭”的目的。本文还回溯“斗争会”在文革以前的发生发展历史即其由来，并讨论为什么“斗争会”在中国发生和流行。

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现有学术理论很难被应用。不过，对苏联的“表演性审判”，以及对惩罚性的身体折磨的展览性的演变的历史研究，都对本文有参考作用。文化人类学的“稠密描述”方法，即用尽可能多的细节来解释人类行动的原因，也对本文有启发。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把文字数据阅读和调查寻访结合起来，而且在两种史源中更加强调后者。笔者感谢接受了采访的文革经历者。本文所引的二手资料，都注明出处。未写出处的，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二、“斗争会”结构和要素

要把文革中开过的千千万万的“斗争会”描述清楚，先要说明“斗争会”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程序。本章首先试图说明：谁被“斗争”？谁来“斗争”，怎么“斗争”

“斗争会”的基本画面是：一个会场，前面写明是“斗争会”，“斗争”谁，什么罪名。被“斗争”的人在前面，面对观众，一般是在一个台子上。他们胸前挂有牌子，上面写他们的名字和罪名。被“斗争”的人至少必须“低头认罪”，或者下跪，或者九十度弯腰，两臂后举，成喷气式飞机的形状。主持大会的是当红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军代表等。

“斗争会”上有三种人：被“斗争”的人，主持和领导“斗争会”的人以及一批“积极分子”，以及数量要大得多的“革命群众”。

这三种人的关系，并不像法庭上的嫌疑罪犯、法官和听众。主要的区别是罪名已经在会前确定好了，主持者不需要听取证据，被“斗争”的人绝不允许为自己辩护，有的嘴里被塞进了木塞子甚至被割断了喉管不能说话。“革命群众”不能拒绝参加也不能反对“斗争”某人，否则他们自己也会被“斗争”。

“斗争会”有相当固定的程序。开场前，先高声大唱“革命歌曲”，大声朗读毛泽东语录，选的语录也往往都是相同的几段。一般以全场一起呼喊口号结束，呼喊的口号也基本相同，不

同的只是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会上发言用的词汇和句式也都相似。每个上场发言的人都会以“高呼口号”来结束讲话。

“斗争会”的主体部分是“斗争”，即对“斗争”对象从身体到精神的侮辱和折磨，其手段和方式也一般相似。有的“斗争会”直接造成“斗争”对象死亡或者身体严重受伤。

1，“斗争”谁？——目标和含义

（1）被“斗争”的主要群体

文革中在“斗争会”上被“斗争”的人中的大多数，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如偷了东西或者打伤了人，犯下了传统和法律认为的“罪”，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群体，如某种职业某个阶层或者某种社会身份。从文革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打击一些有“过错”的个人，远不及打击几个大的社会群体能对以往社会能产生强大的冲击和达到改变社会的目标。因此，文革的迫害是所谓“群体性迫害”，即迫害对象是社会中的一些群体。（在纳粹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杀戮，是最典型的“群体迫害”，以致被叫做“种族灭绝”。）这些群体在中国早已有之，文革中成为“斗争对象”。他们中的具体个人，当然都有个性也有道德方面的优点以及缺点，但是他们被“斗争”并不主要因为他们个人的性格或者道德，而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成为革命的指定的打击对象。个人的因素在他们的遭遇中其实只占很小的分量。文革不是打击贪污犯或者小偷流氓的“革命”，那些古已有之的罪行是个人性的。文革在指控“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指控了一些很大的从前不被认为是坏人的社会群体。

文革中，教育工作者是最早被“斗争”的、也是被“斗争”的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在笔者所做的涉及几百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所有的校长，包括大学、和小学的校长，都在“斗争会”上遭到过“斗争”，没有例外。在千千万万校长中，显然一定有当得较好的，也有比较差的，甚至可能有罪犯，但是他们都无一幸免地被“斗争”了。教师中相当高比例的人都遭到过“斗争”，在有的学校超过三分之一。学位较高、级别较高、业务较突出的教员中遭到“斗争”的比例高于其他人。大学里的教授和副教授，都遭到“斗争”，高级讲师也很难逃脱。

最早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文革受难者，是教育界的人。据笔者的调查，他们是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学长李敬宜和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1966年8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1966年8月5日）。在他们之后，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遭到残酷的“斗争”而身亡。关于他们的死，在笔者《文革受难者》书中有详细说明。书中也写了20名被迫害死的大学负责人。他们全都遭到过残酷“斗争”，有的甚至死于“斗争”现场。笔者曾在电脑网上作问卷调查，是否有学校在文革中没有“斗争”校长和教员，得到的肯定回答是零。

另一个很早遭到“斗争”的大群体是文学艺术界人士。当时全国的知名作家，除了郭沫若（中国文联主席）和茅盾（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二人以外，全部都遭到过“斗争”。名字排列在他们二人后面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1966年8月23日下午，和28名作家、演员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在北京文庙一起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斗争”，包括下跪、火烧和毒打。他在第二日投湖身亡。一名当时是北京景山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受访者说，他们班“斗争”过班主任，因为他曾经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两小块文章。文艺单位都是成年人，不像学校有大批暴力的“红卫兵”学生。实际情况是“革命大串连”使得学生红卫兵参与“斗争”作家。作家老舍就是被中学红卫兵残酷“斗争”后死亡的。

另一个被“斗争”的大群体是受过专业教育的医生、科学家、工程师等等。例如，1966年8月13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召开“斗争会”。地质学家谢家荣和他的儿子谢学锦等几十人被强迫跪在地上被“斗争”。谢家荣留学欧美，曾任地质部总工程师，对中国矿业开采有重大贡献。当天晚上谢家荣在家中服安眠药身亡，时年68岁。他家的老保姆机智地烧掉遗书，称他因病死亡，以免招来更大罪名。当局把尸体送到医院解剖检验。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尸体还未缝合就被送去火葬场。他的妻子吴镜依在一周后服安眠药身亡。他们的儿子谢学锦在文革后当选为科学院院士，给笔者讲了这一悲惨的往事。谢家荣先生被“斗争”，是在北师大女附中学校卞仲耘在“斗争会”上被打死八天之后。“斗争”他的人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不是中学生红卫兵。他没有在“斗争会”上被当场打死，但是在死后遭到剖尸。解剖不是为了医学目的，而是为了要给他定下“畏罪自杀对抗文革”的罪名。福建将乐县医院的俞诺医生，1930年代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当地有名的内科医生。1969年他被关在“学习班”（文革新词之一，听起来像是“学习”，实际上是关押）时，曾被绑在县城中心十字路口的路灯杆子上“斗争”。很多人围观。他脚下放了块石头，有人多次把那个石头抽走，让他悬吊在电灯杆子上。文革中，有高级职称的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除了从事军事工业的以外，几乎全部都遭到“斗争”。

在教育界和科技界，集中了曾到外国留学的人。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到西方留学，引进了现代科学和技术。他们遭到“斗争”的比例特别高。例如，据笔者调查，1949年以前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后归国服务的学者中，至少有12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中有江西安福县王均，1926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大学和中学教员，1950年代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八年。文革开始后，王均被戴高帽子游街，被打，被关押。1968年5月，江南镇上召开“斗争会”，他的妻子（安福县中学代课老师）被叫去“陪斗”（这是文革新名词之一，下文有更多解释），看到王均已经站不起来，是被放在板车上拖来的。他对妻子说：“我已经许多天不能饮食，腰骨也被打断，恐怕活不下去了。”“斗争会”后他被带走，从此家人再也知道他的音讯。文革后，安福县中学的一位老师传来话，那个“斗争会”后某天，红卫兵曾命令他和另外三个老师去荒山上挖坑埋尸体，他偷偷揭开卷尸体的席子看，发现是王均。王均的确切死亡日子和地点至今不清楚。他的亲人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斗争会”上。

以上这些人，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是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发动文革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的要打击的群体。在关于文革的第二个纲领性文章，1966年8月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布之后不久，毛泽东决定让全国各省市县的首长全部“靠边站”和把他们“打倒”。他们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1967年1月开始了所谓“夺权”，派遣大批军人支持各地“革命造反派”，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来统治全国。这样，文革前的大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科长以上）成为被“斗争”的另一个大群体。

文革中，全国各省和自治区的最高首长，除了广西的韦国清以外，全部遭到清洗。各省的省长副省长遭到“斗争”的不在少数。黑龙江省领导人李范五等被“斗争”的场面现在可以清晰看到，因有记者留下照片并且在近年发表出来。直辖市中，北京最先，上海继后，被罢黜的原领导人都遭到大会“斗争”。对党政干部的“斗争”在1967年形成高潮。“斗争”大干部成为“时尚”，一些“革命造反派”组织争抢大干部去他们的“斗争会”，以显示他们的革命性和重要性。这种“斗争”的最高潮，是在196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中举行“斗争会”，分别“斗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及另外两个高层领导人，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陶铸（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这三个“斗争会”都拍了电影。拍摄刘少奇被“斗争”的电影有小部分现在流传在外可以看到。就结构和形式来说，和其他“斗争会”差别不大。

由于各种原因，难以解释可能是其中之一，对大多数干部被“斗争”的事情现在很少说明。

西方学者则对此表示觉得神秘不可解。其实，斯大林和波尔布特都同样大规模地清洗过干部，只是他们可能没有使用“斗争会”作为主要方式。

再一个大群体，是在1950年代就被“打倒”了的有产阶级（有土地和工厂、商店的人）以及“右派分子”（被认为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人）。他们在文革前就被当作“敌人”对待，文革中遭到更严重的迫害。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昌平区被“斗争”杀害的327人和在北京大兴县杀害的324人就属于这个群体以及他们的子女。（数字来自官方当时的内部统计。）在笔者《文革受难者》书中写了昌平区“西三旗”的“黄土南店”村（今“回龙观”小区）召开“斗争会”，通知村民带棍子参加。开始无人敢动手。一个复员军人先动手以后，群众被激发起来。19个“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子女被活活打死。

虽然中国的有产阶级在文革前已经被剥夺了产业，但是1966年有些人还有住房，自己居住，或少量出租。在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中，1966年9月，政府发出文件没收了城市里所有的私人房产。而房产主们虽然毫无抗拒就交出了房契，还是有很多人遭到“斗争”甚至被杀害。当时住房紧张也是一些人通过“斗争”占取他们的房产的强大动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后改名为“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员齐惠芹，家在北京东四刚察胡同1号，和丈夫以及三个儿子住在自己房子里，有几间房出租给别人住。她在“斗争会”上被剪了头发，被逼喝墨汁，最后被打死。

（2）“罪名”

被“斗争”的人都有“罪名”。这些罪名一般写在“斗争会”的会标上，也写在挂在被“斗争”者胸前的大牌子上。他们的罪名不是古代传下来的偷窃、抢劫、伤人和杀人。不但“斗争会”这个名称在汉语中前所未有，文革中被“斗争”者的罪名也是全新的。

“反革命黑帮”，简称“黑帮”。在1966年，先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三个写杂文的人的共同笔名），再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的大干部，后来扩大到北京大学领导人陆平等，后来再扩到到各学校的领导人，等等。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罪名写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开始文革的“通知”中和其他的文件中。不但大学教授留洋学者基本上都被囊括其中，中小学中业务拔尖的教师都被算在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罪名写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和8月8日发出的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都被列入其类。他们二人都在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中，遭到“斗争”。

“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在1967年1月的《公安六条》中）。“历史反革命分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个说法出自毛泽东在1969年初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中）。

这些罪名都出自指导文革的“中央文件”（文革中下达了很多这类文件），上面有毛泽东的“圈阅”或批语，有的段落是他亲自写的。以中国人口之多，每发明一个新罪名，就有一大批人被囊括在其中。

从“斗争会”照片，看得到这些“罪名”被写在被“斗争”的人的胸前大牌子上或者头顶高帽子上。后来发生的一个混乱是，文革后用了个词语“冤假错案”为受害者“平反昭雪”，

以致难以分辨，是被“斗争”的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还是这些罪名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下面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3）不同的被“斗争”者和共同的被“斗争”原因

除了以上几大群体，调查中发现有各式各样的被“斗争”的人。

文革中被“斗争”的人大多年纪较老，一般都在35岁以上。这容易解释。虽然文革没有说要“斗争”年纪大的人，但是因为35岁以上的人在1949年已经18岁成年，多少会和前政府有关系，也可能加入过“反动党团组织”（指国民党和三青团等）。另外年龄大的人也会在工作场所有比较高的专业地位或者行政地位，其中专业人员可以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行政干部（科长级以上）可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明确制定的两大类打击对象。年轻人不可能是“当权派”或“学术权威”，但是也会被“斗争”。

红卫兵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阶级路线”，把所谓“坏家庭出身”的同学称作“混蛋”并“斗争”他们。1966年8月4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二四班开“斗争会”“斗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意思是他们的父母是“狗”，他们是“小狗”。“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不红不黑”的孩子坐在地板上。十名“狗崽子”站在教室前方，被用一根长绳子拴起来。被“斗争”的学生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还打了她们。一名受访者的脚被踩伤，至今天阴下雨会疼痛。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召开大会，全校128个“狗崽子”全部跪在地上被“斗争”，有的人还遭到毒打。这个学校总共只有60名教职工和500来个学生，128人是很高的比例，而且显然被“斗争”者中大多数是学生。

另外，年轻人因为冒失而说话不注意，被指控有“反动言论”。在北京大学，文革中九名学生在被指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后“自杀”身亡。加上引号是因为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其中，中文系三年级女生刘平被她的同班同学开会“斗争”时，被扭作“喷气式飞机”（下文将作解释）。刘平在1968年12月4日服毒身亡。在复旦大学外文系，1968年初的一个晚上，三年级学生杨雷生在全年级的“批斗会”上被“批斗”，第二天一早他在学生宿舍七号楼跳楼身亡。另一名三年级女生也被指控为“思想反动”遭到“批斗”。1968年3月在学生宿舍九号楼跳楼，没有死，大腿骨骨折。她的同学们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召开“斗争会”继续“斗争”她。她是在医院的有轮子的床上被推进来的。该系还有一名二年级的女生也被“斗争”，跳楼未死，终身坐轮椅。

在笔者采访过的人中，被“斗争”时年龄最小的是北京太平路小学的一名女学生。1968年她被“斗争”时八岁。她1967年入小学，1968年被指控“书写反动标语”，加上她父亲那时因曾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在单位被“隔离审查”，小学生开会“斗争”了她。在调查中听说的最年幼的被“斗争”的人，是托儿所里的孩子。他的父亲张文松是文革前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教育部部长，负责北京的中小学教育，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全家被从以前市委领导的宿舍驱逐到北京“五四大街”上给市委勤杂人员住的大杂院里。幼儿园的阿姨把他带那里，让他跪在自己家门口被“斗争”。“记得是他说了什么反动话。”当时14岁的同院邻居说，“但是不记得是什么了。”一个还在托儿所的孩子，能说出什么“反动话”呢。

外国人也遭到“斗争”。1966年8月24日，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在东单三条“斗争”了玛丽亚方济格修女会的八名外国修女。（见照片）。这是在修女会门前的台阶上，只看见修女

的白色袍子和头巾却看不到她们的脸，因为他们都被迫弯腰90度作“认罪”姿势。他们随即被驱逐出境，其中一人在到香港的路上去世。他们在北京为外交官子女办学校，却被指控为进行“反革命活动”。她们是北京最后的既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国专家也不是外国驻华使馆外交人员的外国人。《人民日报》赞扬了红卫兵的这一行动。一名当时初中二年级（北京第二中学）的受访者说，他没有去抄修女会，但是吃到了同学从修女那里抄来的巧克力糖。

甚至已经被迫害致死的人也被“斗争”。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被指控和“右派分子”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拳打脚踢地把一长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从教学楼四层的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北京大学中文系负责人程贤策，从1966年6月中旬起就不断遭到“斗争”，在9月5日服毒“自杀”。他死后中文系开会，把他的名字写在白布上，和其他教授、系副主任一起被“斗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季谷教授1968年7月25日被“斗争”了整整一天，罚跪在地，背上被红卫兵学生用香烟烫了几十处。深夜才放他离开，他投入校园中的丽娃河身亡。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在系中召开“斗争会”，用纸画了李季谷的画像，命令一名“有问题”的人举在手里。他的画像和几十名教职员一起被“斗争”。

古人也遭到“斗争”。1966年8月24日，北京十三陵博物馆开大会，“斗争”并烧毁了从陵墓中挖出的万历皇帝的骨骼（已经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用铁丝穿起来）。（《风雪定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341页）。近代历史上的名人张之洞、康有为，不但被掘墓，而且被打开棺材“斗争”（见凤凰网）。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11月到曲阜召开十万人大会，砸毁孔子塑像和石碑，把“孔林”（孔家墓园）的很多坟墓掘开。这些破坏虽经修复，至今仍然可见痕迹。

笔者在云南省边地农场当“知青”时，1971年初队里举行“斗争会”，“斗争”了一名工人，还有他种的一株辣椒。他的妻子是成都人，嗜吃辣椒。那时政策不准各家自己种植，他悄悄到山里砍去野草辟出一片餐桌面积的地（那里有的是这样的荒地），用竹子编成篱笆围起来（那里的野生竹子非常多），种了一株辣椒（辣椒在那个温暖炎热的地区是多年生植物并常年挂果，极易栽种取食）。军代表把全队的人引到那株小小的辣椒前（半天没有上工），带着人们高喊“打倒XXX”（那位工人的名字），毁掉了那株辣椒。这个行动当时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

老人、年轻人、孩子、外国人和死者、古人甚至一株辣椒都被“斗争”，看起来相当混乱，也有人说这是“失控”，不能责怪文革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人被“斗争”的“原因”是相当明确相当一致的：他们和资产阶级有关系（子女）；他们和传统的思想理念有关系（信教的人）；他们有和文革领导人不一致的思想（他们“反动话”，可能实际上并不十分与当局对抗但是有异议或者有不敬），他们和私有制有一点关系（比如那棵辣椒）。“斗争”这些人，在打击这些人的同事，也打击了他们蒙受的罪名代表的理念和价值观，如资本主义，如教育和学位等等，也大力肯定了文革的理论和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和“传统的所有制”以及“传统的思想”“彻底决裂”——文革时代称之为“两个决裂”，以便上口好记。实际上，从这些“斗争”对象，可以清楚看出文革一直乱中有序，方向和目标都非常清楚。被“斗争”的人要为自己辩护以逃过或者减轻惩罚，只有竭力声明自己要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强调自己“无限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甚至直到在文革后给被“斗争”的人“平反”，也只说是“冤假错案”，意思似乎是说这些人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却没有从理论上指出这些罪名本身是不成立的。

除了被“斗争”的人，有的“斗争会”上还有一类人“陪斗”——这是文革新词语之一。

中文以前只有“陪客”一说，相对于“主客”而言。“陪斗”这类新词语的出现，标志着“斗争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结构更加复杂和精致。上文已经写到江西省安福县王均的妻子“陪斗”。有的“斗争会”上，“陪斗”人数十分可观。在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在北京最大的会场“工人体育场”的“斗争会”，校长被“斗争”，系一级的领导人（包括各系的正副主任以及共产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则“陪斗”，而北京大学当时有二十多个系。在清华大学“斗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时，“陪斗”者中有国务院副总理等等。王光美站在桌子上，身后有两个红卫兵拉着她的手臂作“喷气式”。“陪斗”的大干部站在地面上，每人身后也有两个红卫兵架着他们做“喷气式”。

在被“斗争”的人中有一个群体，先“斗争”别人，然后自己被“斗争”。他们是那些在文革初期领导文革的各省市县的领导干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组织了各种“斗争会”“斗争”文革的第一批“斗争”对象，即学校教师和校长，作家和艺术家等等。可是半年以后，他们被“夺权”了，也成为“斗争会”的对象。他们对别人施行的残暴手段都回报到了他们自己身上。这里用了“回报”，这不是佛教所说的做了坏事得到上天的惩罚即“因果报应”。这是一种“体制”导致的“回报”。他们组织和提倡野蛮残酷的“斗争会”，后来自己也身落其中。因为这个，虽然他们后来也“否定”文革，却只愿意谈他们被“斗争”却不愿意谈他们“斗争”别人。出于这种利害关系考虑，文革的这一部分历史常常被隐瞒不提了。

2，谁“斗争”？——动力和动机

在“斗争会”场上，大多数人是“斗争”别人的人。他们是被“斗争”者的对立面。但是“斗争”者其实有两类。一类是“斗争会”的领导和积极分子。他们坐在会场前面的台子上并占据扩音器（如会场较小则没有台子和扩音器），主持会议，宣布开始和结束，作大会发言。他们控制“斗争”的进程，包括会前选取“斗争”对象和会后决定进一步的处罚方式。

会场布置也明显分开了这两类“斗争”别人的人。主持者们坐在主席台上，“群众”在台下，常常坐在地上。在他们和“革命群众”之间，隔着被“斗争”的人。

回看历史事实，主持“斗争会”的人都是当时的掌权者。随着他们失落权力，主持“斗争会”就会变成另一些人的特权：最早开始是“工作组”（1966年8月以前）召开“斗争会”。然后是“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再后来就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建立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首长，其中有很多是军人。例如，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主楼前“斗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有几十万人参加，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斗争会”。主持“斗争会”的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兵团”“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负责人。从1969年到1970年，在北京大学进行“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时召开了七次全校性的“宽严大会”，那是“斗争会”的一个亚种。第一次1969年7月21日，军代表迟群作了长篇的威胁性讲话。迟群是中央警卫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被派主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所大学，1974年几乎当上了全国的教育部长。第二次1969年8月8日，中央警卫部队的“王副政委”王连龙发表长篇讲话。此后他主管北京大学8年多。一方面，这些“斗争会”显示了他们的权力和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因为“斗争会”是当时的主要“革命”活动之一，积极领导和从事这样的活动才能获取和保持权力。蒯大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一个普通二年级大学生变成清华大学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名声远播全国，出行乘坐那时高级干部才有的小轿车。迟群和“王副政委”都教育程度不超过初中毕业却执掌大学多年直到文革结束。他们充当了文革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和打手，也得到职位和权力作为奖赏。

“斗争会”上有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斗争会”上押解被“斗争”者，强迫他们低头

弯腰双臂后举作“喷气式飞机”状。他们挥舞拳头高喊口号“打倒”“砸烂”和“万岁万万岁”。他们动手殴打被“斗争”的人，把脚踩在被“斗争”的人背上（见上海照片）。留下的“斗争会”照片虽然不多，但是可以看到这些人脸上欢喜的得意的表情。这些人有的得了官职，有的出足风头，也有的至今抱怨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实际上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中主宰他人身体和性命的权力快感，就是他们得到的“好处”之一。利益不仅有金钱和物质的，心理的满足也是一种。文革后，他们其实只有极少数受到比他们对别人的迫害远为轻的惩罚。大多数顶多是失去了原来预想的出将入相的升迁机会。文革后这些人诚恳道歉的也很少。这些人很可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看权力的诱惑怎么鼓励一些人会做出凶蛮暴力的事情来。

另一种人数量最多，即所谓“革命群众”。他们坐在台子下面。他们和“斗争会”领导人之间隔着被“斗争”者。他们没有权利决定“斗争”谁，也不能为被“斗争”的人辩护，他们只能随着台上的人的指挥，挥舞手里的毛泽东语录，举拳头喊口号。总的说来，他们是被动的，虽然他们也确实“斗争”了别人。

对很多成年人来说，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他们领取着工资参加这样的“斗争会”；参加时不是站在被“斗争”的人中，而是在“革命群众”队列中，给他们相当的 安全感。如果被“斗争”的人过去与他们个人有仇怨，他们还可能感到出了口怨气。如果他们公开拒绝“斗争”别人，他们自己会马上也遭到“斗争”。在大量人次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两个名字。他们曾经被通知而没有去“斗争会”上“斗争”他们的同事和学生。其中一位的名字是由被“斗争”者因为感激而记住的，另一名是自己在文革后说出来的。他们请了“病假”一天。能这样做，显示了他们的道德感还没有被“革命”全部冲垮。但是这样做的人实际上非常少，对“斗争会”造不成什么影响。

对一些人来说，“斗争会”还有别的意义。一名受访者说，1967年他去过北京航空学院对彭德怀和张闻天（资深共产党领导人，批评过造成了大饥荒的政策）的“斗争大会”，当时他15岁。他回忆往事，说，“小孩儿嘛，哪里有热闹就上哪儿。只要被“斗争”的不是你家的人。”另一名年龄相仿的受访者说，记得到北京大学看“斗争会”，人太多，他个子矮，就学别人爬到树上看。学校不正经上课，又没有电视可看（几乎没有人家有电视机也没有什么电视节目），文革前出版的文艺书籍都被禁止，连体育比赛也都停止。学校操场，音乐堂，剧场，体育馆，都用来召开“斗争会”。“斗争会”对青少年具有了“娱乐”作用。

一名受访者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一年级学生。1966年8月，这个学校的校长赵香蘅遭到“斗争”和殴打后，与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这名小学生记得他参加了赵校长死后的一个“斗争会”，“斗争”已经死亡的赵校长和别的活着的老师。这名一年级小学生记得在会上，他最初不懂说赵香蘅校长“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什么意思。他在那个“斗争会”上学会了“新词”。

“斗争会”总是把上述三类人分得很清楚。上面写到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斗争会”上，被“斗争”的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则坐在椅子上“斗争”她们。还有20来名家庭出身“不红也不黑”的学生被指定坐在水泥地板上。这三种情况的含义都很明显。“斗争会”还未正式开始，三类人的位置和姿势就把她们作了清楚的区分。两个月前这40来名15岁的学生还是一起坐在椅子上听课的同学，现在被划分成这样三个等级。也可以说，这也是文革时代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划分，才可能激起仇恨和冲动，使得文革得以持续进行。

（未完待续）

~~~~~  
【运动记愧】

我的忏悔

• 杨 健 •

近几年，我常为当年所做的错事折磨，有时深夜醒来，就不能再入眠，我无法解除沉重的负罪感。负罪难脱的人是悲惨的人，如果永远不得解脱，同活在地狱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忏悔才能得到救赎，也曾考虑对受害者及亲属进行道歉的可能。当前出现的“忏悔”论争，使我意识到对个人的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侵犯。私人化的过失忏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带社会性质的犯罪，进行公开忏悔是一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我愿意公开地忏悔，以证明我的诚意，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救赎。我打算发表这篇短文，或是上传到互联网上。对于具体受害者，则等待私人化的机会进行谢罪。

1966年，我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但是作为一个“红五类”，我积极地投入了“文革”运动。我曾满怀热情跟随一些中学红卫兵参加了“鬼见愁”对联的辩论会，支持过“血统论”，还追随他们参加了“红八月”的抄家活动，并有过两次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我参与的所有抄家中，性质最严重的有三次。

其一，参与抄“大右派”章乃器的家。这次抄家有机关造反派、中学红卫兵，我只是一个追随者，但是在最初却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我参加了对章先生的围攻，喊过口号。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对章先生进行身体伤害。抄家没有结束，我因为学校有事就退出了。

其二，抄一个资本家的家，地点在史家胡同幼儿园边上的一个院子里。我当时是一个小学红卫兵的头头儿，带着几个小学生接受一些中学红卫兵的领导。我在这里有过两次加害行为，一是对无辜者抡皮带。我所受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是不允许打人的，这些教养多少挽救了我，使我当时抡皮带只是摆样子，并没有真用力打。一是用水戏弄恐水病患者，几个红卫兵把她绑在椅子，试验她是否怕水，我围观和插手了这一残忍的“试验”。

其三，抄一个市民的家。地点大约在南小街的一条胡同里，是一个两口之家。他们是普通知识分子，看上去像小学教师。当时有三个红卫兵组织在场，抄出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外国民歌。女主人因为丧失了心爱的唱片，悲痛欲绝地叫喊起来，她的丈夫极力去安慰她，这一场面使我受到强烈震动。

抄家本身是一种严重的暴行，特别是我担当的职务，领着组织成员去抄家，所承担的罪责更大。我对组织成员也有失责的罪过，以我当时的身份如果能有所觉悟，本来是可能警戒或阻止相当一部分小学同学犯罪的。

在“文革”后期，保守派红卫兵失势后，我父亲所在机关的造反派们，开始以革命的名义整肃“联动”和“流氓”。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处于批判运动的边缘，但也曾迫于压力，怯懦地在批判会上对一个邻居（初中生）做过批判发言，尽管这个人事后宽恕了我，还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但是我至今无法原谅自己。

章乃器先生已经去世了，在这里我向章先生的亲属，以及自己曾加害的人们表示道歉。我

准备接受来自社会方面的追究和审判。

回想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幼稚、愚蠢，甚至是昏乱的。当年自己14岁，对人生、社会和政治的知识极为肤浅，灵魂还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参加运动的动机其实比较简单，作为“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接班”充满了向往，令我激动的是能以一种优越身份参与一场富于浪漫色彩的革命。我的“革命”动力，除了领袖崇拜，也有利益驱动，只不过当初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我既没有思想，也缺乏判断力，甚至不具备真正革命者的勇气。我只是一个准备去革别人命的人。

回首我的过去，我看到的是一个渺小、丑陋的形象。就在那一刻，我的命运已经被确定了。作为一个对自己行为缺乏责任感，对自己无法负责的人，却去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

我知道，悔罪的话语是苍白无力的。忏悔与灵魂自救有关，但对已犯的罪行无补。用血写的罪，不能用墨来补偿；用行动加害的罪，不能用道歉来补偿。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切实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呢？只有用己血来洗他血，以己泪来抵他泪，以义举去抵偿罪行。所以不仅要忏悔，还要设法抵罪，以各种方式补偿社会。

我现在知道只有用善行来抵消恶行，才能切实地疗治心中的愧疚。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道路。我鼓足勇气踏上这条路，以求得到获救的希望。虽然救赎之路对于我来讲，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但是我知道，只有走上这条路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人的生活，才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我知道无论我是否向受害者进行了请罪，如何谢罪，是否得到宽恕，我的罪也是永在的。我的负罪感不会减少。我必将负罪而行，直到死亡。我并不因此而沮丧，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宿命，这就是我的人生。

由于我的灵魂欠缺力量，我知道自己的忏悔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我的反思也许仍然掺杂有文过饰非的因素。我的救赎之路还很长。

□ 原载《我们忏悔》

~~~~~

【亡灵祭坛】

为人权被处决的张九能

• 傅国涌 •

1970年3月5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同一天，湖南长沙一个叫张九能的大学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九能是谁？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关信息，只有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囚禁的灵魂》中提及此人，称张九能等人“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努力打了个句号”。不久前，有朋友送我一本陈秉祺的《毕业之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反动学生”的经历》（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转引此书只标页码），这本满含血泪的回忆录中，作者不仅记录了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并首次披露了同学张九能罕为人知的故事。他们都是1957年考入西安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1963年临毕业时，陈秉祺因两年前私下跟几个好友说起甘肃家乡饿死人的事，而被举报，成了“反动学生”，遭受两次屈辱的批斗会，每次批斗之后，张九能都不避风险、约他出去吃宵夜，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就是这时，他首次听张九能说出“人权”这两个字——

“不允许人说实话、不允许人有自由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不允许被批斗者有申辩的权利——这些，都是严重地侵犯人权……”（34页）

在1963年的中国，党权早已遮没一切，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将中国人整得如同掉光了叶子的枯树，“人权”在中国大陆被删除久矣，红色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接触到这个观念，即使偶然遇到这个词，也不容易引起注意。张九能却不仅熟悉这个词汇，而且敢于用这样的观念思考。这在那样的时代氛围当中是何等大胆、又是何等超前，而他并未意识到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此后，陈秉祺被押送到农场，开始漫长的苦役。张九能选择主动退学，回到长沙老家。1967年“文革”浪潮汹涌，陈秉祺因为母亲迁葬，从农场请假，应邀去长沙与张九能相会，岳麓山上，黄兴、蔡锷墓前，张九能对远道而来的挚友直言自己想组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组织，“成立一个‘争取人权同盟’的组织，你的遭遇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起码的人权才造成的，你说是不是？”（123页）

1963年7月23日，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中发（63）496号文件），一夜间就可以将陈秉祺等许多大学生投入几十年的厄运当中，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就学的学者王学泰也是“反动学生”（回忆录中有个序言就是他写的），当然就是因为缺乏人权的保障。

那一刻，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权大致上都等于零，除了毛泽东，即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自保不了，周恩来诚惶诚恐、至死还在呼喊“我不是叛徒”，居一人之下、无比显赫的林彪也只能等待莫测的前途，不要说彭德怀、贺龙他们了。张九能，一个普通中国人，竟然提出人权，这本身就是胆大妄为，还敢想什么“争取人权同盟”，无疑飞蛾扑火，注定粉身碎骨。所以，陈秉祺当场表示：“我坚决反对你的想法，因为远不是时候，百年或五十年后，看能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正是这一“坚决反对”的态度使他成为幸存者。张九能却不以为然——

“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提出来？中国的第一问题就是人权，有了人权的保障，才能有民主、自由、平等；有了人权，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有了人权，才可保护知识精英；才能保护人类的共同文明；才可防止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才可使谎言和告密不会成为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

中国目前有千千万万个各种团体和组织，就唯独缺少保护人权的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肩负起一点点国人和时代的责任，组建一个‘争取人权同盟’呢？是争取，仅仅是争取啊！”（123—124页）

中国确是一个人权观念稀缺的国度，晚清才引入这一观念，还远没有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生根。孙中山提出了“民权”这个概念，并将民权主义作为他的三民主义之一，但他说的民权与人权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明确指出，“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进一步解释：“有管理众人之事的权力，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54—255页）他心目中的民权，并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与尊严，这与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确立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与《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些基本准则，有着很大的距离，孙中山只是从政权的角度提出民权，并不具备真正的人权意识。毛泽东掌权之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反人权的，甚至可以说以消除人权为根本目的。而在毛统治的巅峰时代，年轻的张九能居然敢想人权问题，甚至冒出组织“争取人权同盟”的念

头来。这不光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超越。人的存在不仅是活着，更珍贵的是有超越的可能性，这才最大也是最终的价值。无论一个时代陷入多么深重的苦难当中，处于什么样密不透风的体制之下，乌云遮住了一切阳光，什么前途也看不到，有思想、有尊严的人，有生命气息的独立个体，依然可以超越眼前的这些枷锁和辖制，凭着内心的光亮，洞察人类文明的奥秘，去仰望遥远的星空，思接未来，拥抱美好的观念，因为他心中有亮光，他自己心中的幽暗便被击破了。张九能说出这番话，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写下《出身论》的遇罗克。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权先驱，虽然迄今为止他还鲜为人知，但他在暗夜中发出的声音真有穿云透天而来的力量，可以穿过一切的黑暗，放射出挡不住的光亮。在20世纪中国人权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张九能这个名字都应该占据一页。

张九能的“争取人权同盟”并没有建立，然而，1968年7、8月间，一次意外的事故使他抽屉里的两篇草稿《目前的时局》、《积极行动起来为筹建人权同盟而努力》被搜出，他因此入狱。1969年12月12日，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69）军公刑字第144号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处他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他在劳改期间“拒不认罪伏法”，1970年3月5日长沙市革委人保部、市公安局军管会（70）军公刑第44号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150—151页）

直到1981年，他的几个同案上诉，换来的说法是：“张九能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上山为匪，已构成反革命罪，属于该判有期徒刑，但不够死刑罪，属于错杀。”三十岁的生命，“错杀”二字就可以轻飘飘了断，根源还是没有人权。张九能的两份原始判决书家属始终没有见过，那两篇致命的“反动文章”迄今也没有人看到过。很多年后，历经劫难、也曾以反革命罪被判二十年的陈秉祺再到长沙，问起张九能的几个侄子为何不为叔叔的平反申诉，他们异口同声：“我们的幺叔是英雄，人都没有了，平反有啥用？”其二嫂则说：“他上无老，下无小，有必要去费力？”（153页）确实，在张九能被杀的土地上，平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权落地，人权，每个人的人权都有保障，那是在漆黑长夜中死得无声无息、如今仍沉埋在黑暗中的他真正在意的。

2014年2月19日

□ 原载作者博客

~~~~~

# 【当事者言】

我见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

• 徐景贤 •

（编者按：本文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四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家里的电话铃声急骤地响起来。

我拎起电话，是中国科技大学来沪的红卫兵许小昆打来的，我和他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相识并有过交往。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道：“我刚从安亭回来。你知道吗，几千个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求市委接见并承认这个组织，市委不予理睬，他们就乘火车北上告状，被困在安亭车站。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同志赶到现场处理。昨天工人们已经接受张春桥同志的意见返回上海，张春桥对他们有过承诺，他们不放心，这批人现在等在文化广场，一夜没睡觉，要求张春桥见他们，但没有办法和张春桥联络。张春桥回到上海后在家里休息，请你无

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转告他安亭回来的工人们正在文化广场等他。”

我知道在安亭发生的事件闹大了，心中也非常着急。

#### ◇ “安亭事件”的发生

安亭是京沪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地处上海市嘉定县的南翔镇附近。一个小站发生的事件怎么会惊动北京的党中央呢？这还得从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运动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在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大学红卫兵的策动下，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等人，参加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经验交流会”，会上确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造反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据王洪文后来告诉我，在促进建立“工总司”的组织中最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来的红卫兵名叫包炮，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成立组织可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总工会和各地的工会组织都由官方筹建，下属各个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决不允许有与此相并行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组织存在。因此，当“工总司”发起单位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承认这个“合法组织”并通知市委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时，市委立即向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陶铸请示，陶铸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宣言》，声称“工总司”“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对于这样的组织，上海市委采取的态度是“三不”政策：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

市委的态度激起了工人造反派的义愤，会后几千工人列队到市委请愿。那天我正好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下班，看到工人们举着红旗，排成整齐的队伍，从淮海中路折向常熟路朝市委前进。工人队伍没有呼喊口号，在沉默中前进，颇有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悲壮的意味。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倾向市委的，但看到这样一支队伍，也从内心感到震慑。

工人们在延安西路市委等了几个小时，要求领导接见，当时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养，他们便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等了几个小时，没有见到市委领导。夜深了，他们又前往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结果只出来一个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劝他们回家。他们激怒了：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我们就到北京去告状。工人队伍冲到北站，潘国平带人占领了两节客车车厢开往南京，王洪文带人登上了六〇二次列车准备上北京。清晨，六〇二列车启动北上，但开出不久，列车就被阻在安亭火车站，引入岔道并被上了锁。天下起雨来，工人们饥寒交迫，据缝纫女工徐美英后来告诉我，工人本来没有准备上北京，她自己脚上只穿了一双布鞋，在寒风冷雨中冻得直发抖。工人们决定孤注一掷，就在安亭铁轨上卧轨拦车，造成重大影响。中午十二点，从上海去北京的十四次列车被迫停靠在安亭。从此开始，京沪线交通全线中断共达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上海站内三十四列火车不能开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滞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了京沪沿线的交通和生产，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铁路交通系统第一起重大的事件——“安亭事件”，震惊全国，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和陈伯达都表态认为阻断铁路交通是错误的，要求工人们返回上海。

#### ◇ 陈伯达发来了电报

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上海发来了电报，全文如下：

陈伯达给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的工人的电报

陈伯达一九六六·十一·十二 （直送上海安亭火车站）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上海市委收到电报以后，立即大量翻印。我觉得这是中央的指示，就布置市委写作班的成员连夜把电报抄成多份大字报，张贴到静安公园的大字报专栏去广为宣传。

#### ◇ 张春桥飞赴安亭

十一月十一日晚十点多钟，张春桥受中央文革委托，从北京飞到上海，立即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成员包炮等人的陪同下，赶赴安亭，和“工总司”代表王洪文等见面，潘国平听说张春桥来了，也从南京赶到安亭。在安亭的汽车修理厂里，张春桥先找“工总司”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写给工人的电报，想说服他们带领工人们返回上海。可是工人们开始时不接受陈伯达的电报，他们认为这个电报只强调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指责这次行动“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为今后上海市委“秋后算帐”处分工人埋下了伏笔，提供了依据。根据“反右派”等运动的政治经验，工人们知道就这样回到上海去再分散到各工厂，肯定会挨整。工人们向张春桥控诉：他们所以要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是因为前一时他们各工厂、企业，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所以他们成立这样的组织是“革命的”、“合法的”，至于这次到安亭来，是“被迫的”，责任全在上海市委。

张春桥和工人谈判通宵达旦，谈得非常艰难。王洪文、潘国平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

有交通大学“反到底”等组织和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的红卫兵为他们撑腰，所以一直谈不下来。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工人们把张春桥请到一辆卡车上，在安亭车站和群众见面。张春桥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动员工人回上海。工人们在现场“控诉”上海市委，反复强调自己的行动是被迫的，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说穿了，工人们害怕自己回去被打成“反革命”。张春桥站在卡车上淋着雨听完了工人们的“控诉”，据他后来告诉我：他觉得工人们的过激行为是有因的，同时他们要求成立这样的组织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精神的，张春桥觉得，听了工人们的发言，原来他来上海以前中央文革考虑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也许是应当改变的。”

在和广大工人见面以后，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他和王洪文、潘国平等商量，要他们先带领工人返回上海，然后再讨论工人们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觉得这是一个下台的机会，最终同意了张春桥的建议，但他们刚向在场的工人宣布谈判的结果，就被别人轰下了台。结果王洪文和潘国平带了大部分工人回上海，另外一个中泥造纸厂的工人耿金章带了一千人去了苏州。张春桥也于当天下午返回上海。但回到上海的工人觉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既然张春桥承诺回上海后再讨论其他各项要求，他们就直接去了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见面。

这就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清晨接到从安亭回来的北京红卫兵许小昆的电话之前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安亭事件”的概况。

#### ◇ 我陪张春桥到文化广场谈判

我在家里接到许小昆的电话后，立刻赶往武康路二号市委写作班，因为在那里市委给我装了一个红色保密电话，可以直通市委各个领导人。我拨通了张春桥家里的保密电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接了电话，她说张春桥半夜才回家，还在休息。我说情况紧急，从安亭回来的工人们聚集在文化广场，等候张春桥接见。这时，张春桥自己来听电话了，他说他正在发烧，在安亭和工人谈判，听工人发言，淋了一夜雨，感冒了，但是工人们既然等在文化广场，他还是准备去和他们见面。他要我先找到他们的头头，以便谈判，他上午还要和市委商量一下。他和我约定下午2时在文化广场后台见面。

放下电话，我赶往文化广场，那里的工人告诉我他们的负责人叫潘国平，现在去了巨鹿路“工总司”总部。我又赶到巨鹿路，找到“工总司”占领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原来住的资本家已经被他们赶走了，只见总部里人来人往，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潘国平在哪里。我亮出了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才有负责警卫的人告诉我潘国平在三楼睡觉。我摸到三楼的一个小房间，叫醒了睡眠惺忪的潘国平。他赤着脚从床上爬起来，穿了一双布鞋接待我。这才看清了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只有二十多岁，方脸盘，小眼睛，说起话来节奏很快。我通知他下午两点张春桥去文化广场和工人见面，要他一定赶过去。

下午，我陪同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我们从永嘉路的大门进入后台。文化广场里简直是一片混乱，几千工人等在大会场里，后台的化妆间、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各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和“工总司”的代表。潘国平已经先行到达等候我们了，但这次谈判的整个过程，没有见到王洪文。警卫员护着张春桥硬挤过人群，进入一间谈判用的小会议室，我跟在他们的后面挤了进去。可是这间房间太小，工人和红卫兵的代表有二、三十个人，都想参加谈判，根本挤不下。于是，临时决定改换大会议室，又闹腾了很久才开始谈判。

说是谈判也根本不像谈判的样子，红卫兵抢过工人的话头，要上海市委保证工人们回到工厂去不会挨整，不被扣工资。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组织的红卫兵申明全把张春桥骂了一通，指责他没有站到造反派工人的立场上来。有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手持一只照相机，向



张春桥提出：“陈伯达的电报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这时，张春桥从他穿的军装胸袋里，掏出几张折叠起来的纸张，把它们展开，向在场的人展示说：“你们看，伯达同志起草电报的手稿都交给我带来了！你们应该听从中央文革的意见。”大家看到了陈伯达用铅笔字在几张白纸上写下的电报全文，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如获至宝，赶紧把电报稿拿过去平铺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摄影。谁知他拍完照片，竟把原稿收到自己的口袋里不肯交还了。张春桥向他索要，他也不肯拿出来。我看到张春桥有些着急了，就主动去和那个红卫兵交涉，我告诉他：“中央文件的底稿都是要存档的，不能由个人保存。”磨了很久，他才把电报稿交还。我赶紧递给张春桥，张又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胸袋里。

这时，潘国平发言了，他事先已经和北京以及上海的几个大学红卫兵商量过，他提出：这次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市委压制工人造反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上海市委负责。现在工人们都听中央文革的话，返回了上海，张春桥同志在安亭说有什么要求回上海以后再讨论。现在陈伯达同志在电报里说我们工人“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这样上海市委就可以根据电报来整我们这些回厂工人。张春桥说，伯达同志在北京，不可能了解现场的具体情况，所以中央文革派我来直接处理。现在上海市委决定向各基层单位发文件，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但潘国平坚持说这样的文件是非不分，一定要承认我们“工总司”是革命组织，我们到安亭去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张春桥说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工人组织将对全国造成影响，劝他们遵守中央的规定，但参加谈判的工人和红卫兵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谈判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结果。

#### ◇ 张春桥签字同意“五项要求”

谈判进行到这个时候，有人向潘国平递去一张纸，上面写了几项要求，潘国平看后交给了张春桥。我站在张春桥的身后，看他拿着这张纸犹豫、踌躇了一阵子，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些文字，并在最后签上“张春桥”的名字。

张春桥签完字说：“那就叫市委印成文件下发吧！”

我拿过这一张写在撕下来的笔记本上的纸片，上面写着“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
-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第二条“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后面加写了一句话：“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最后是他的签名和日期、地点：“张春桥一九六六·十一·十三于上海”。也就是那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拿起照相机摄下了这个张春桥签字的镜头。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天上午张春桥在接到我的电话以后，曾就下午如何和“工总司”谈判一事，参加过市常委会，在会上，常委们的意见是：不能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承认在安亭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下午在文化广场，市委办公厅还派来一个秘密联络员，到现场了解谈判的进展情况。他看到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了字，赶快打电话向康平路市委书记处汇报。曹荻秋等人大为恼火，指责说张春桥去了中央文革，是否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要不要执行市常委会的决定？

但是，谈判会场里的工人代表和红卫兵们，看到张春桥终于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了，一致兴高采烈，纷纷拿出自己身上的《毛主席语录》，让张春桥签名留念。潘国平更是兴奋万状，他急于向坚持在文化广场大会场里的工人们报喜，便邀请张春桥到前台去和工人见面。于是，一群人簇拥着张春桥从后台走到主席台上。台下苦熬了好几天、疲惫不堪的一千多名工人渴望知道谈判的结果。潘国平向大家宣布了张春桥签字同意的“五项要求”，台下一片欢呼。张春桥在欢呼声中作了简短的讲话，鼓励工人们回到单位去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工人们大声呼喊口号：“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从此，上海“工总司”的头头们把张春桥看成他们的“恩人”，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讲：“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老头子’了！（“老头子”是旧社会上海帮会成员对总头目的尊称）“

大会结束以后，张春桥和我回到后台，但他很快又被人群包围起来，各个组织纷纷要他签字，刻制图章问题，解决经费问题，买摩托车问题，发红袖章问题等等，围得他没法脱身，人们把门都堵住了。这时，市委警卫处的警卫员很机智，看到会议室有个窗口，很快搬几张桌子到窗前，扶着张春桥上桌子，从会议室窗口爬了出去，我也跟着翻窗户，外面有警卫员接应，把我们塞进轿车，一口气开回康平路市委。

◇ 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

回到康平路，张春桥径直去了大院里他的家，没有到小礼堂去和等候在那里的市委常委们见面。我走进康平路小礼堂，看到市委常委们都分散坐在沙发里，他们已经听取了派往文化广场的办公厅联络员回来的汇报，知道张春桥签字同意“五项要求”了，曹荻秋一付气鼓鼓的样子，嘴里在不断地埋怨，王少庸猛地吸着烟，瞪着眼睛不作声，杨西光被复旦大学的学生揪斗过了，精神萎靡地蜷缩在沙发里。公务员老李悄悄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这才想起还没有吃午饭，老李给我下了一碗卷子面。我吃完面条，看张春桥还是没有来，我在这里也插不上什么嘴，就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张春桥回家去给陈伯达打了保密电话，汇报了他谈判“五项协议”的经过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并同意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认为他对“五项要求”的判断和签字是正确的。作为对立面，市委的其他领导则认为张春桥的处理决定没有和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商量，他擅自签名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也在这天晚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向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陶铸打电话告状，陶铸听了电话认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这样，中央政治局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听取了汇报，一锤定音，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张春桥胜利了，“工总司”成了革命的合法的组织，造反成了革命的行动，原来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都被颠覆了。本来，毛泽东派到各地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已经让各级党委头痛了，但是因为工人、农民都没有动，各地的党组织还稳得住大局。现在不行了！由于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工总司”组织的出现，并得到张春桥的承认、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最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面那个从魔瓶中放出来的怪物一样，一股工人造反派的力量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收不回去了。

从此，上海大乱！从此，全国大乱！

有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说张春桥是个“投机分子”，投对了，飞黄腾达；投错了，身败名裂。我觉得这种分析流于肤浅。固然，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以后是说过：“我当时是提着

骷髅头（上海话读成“骷郎头”，即脑袋）签字的。”在他的身上有着巨大的压力，除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以外，还有中央的周恩来、陶铸等人，原来都是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的跨行业工人造反组织的，而且张春桥被派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手中并没有握有毛泽东所授予的“尚方宝剑”。但他在听取了工人发言以后，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撤职、坐牢的风险，毅然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五项要求”，是因为他从一九六六年年中调至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深深体会到毛泽东的意图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陈规和习惯势力，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已经通过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但按照他一贯的思想：学生运动如果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张春桥敢于在“安亭事件”中签这个字，说明他善于审时度势，真正“吃透了”毛泽东思想。此后，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果然一发而不可收，十一月十三日，陈伯达提出了一份关于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明确提出“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十四日，周恩来同意召开工交座谈会讨论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目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十二月六日，林彪出来做结论了，他在工交座谈会上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全国每一领域，渗透每一领域。

由此看来，张春桥敢于签字不仅仅是投机，更主要的是他善于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做出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最大范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这场运动的胜利。

毛泽东果然批准了张春桥“可以先斩后奏”，虽然这是事后授予的“尚方宝剑”，但更能说明张春桥善于体察、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思想意图。从此以后，张春桥一直深得毛泽东的垂青和重用。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 【史实辨析】

### 林彪“逃席事件”的真与假

• 马双有 •

在共识网上读了刘家驹先生的《林彪与“九一三”之谜》，受益匪浅，感触良多。文中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刘先生口述的一些故事情节，和公开发行、流传于世几十年的一些历史情节发生了冲突，让人疑云丛生，难辨真假。

现将这些发生冲突的情节一并公布，让大家分析探究，去伪存真，看谁的描述更符合真实，看能否达成共识。

一个是根据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亲身经历写的作品，如胡哲峰、于华民著《毛泽东与林彪》；王振华、周少华著《中国故事·林彪之谜》等。作品是这样描写的：

“五一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

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过去他有一个习惯，凡是与毛泽

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 5 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撇上一眼。

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 5 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腔，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

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现在两人搁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杜修贤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候机会再拍更好的镜头。过了一会儿，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了，人不见了！

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

这件事引起记者们的种种议论：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还没开片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彪今天是怎么了？他来的时候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周恩来心里十分恼火，为了维护大局，有些话不好讲，便狠狠地“熊”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们：“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为什么不拍摄呢？”

受批评的记者有的不服气，小声辩解道：“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周恩来实在憋不住了，一手插腰，一只手边说边在空中画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手快眼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等了一会，看到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内疚的样子，周恩来放缓了语气：“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与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民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烟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呆了几分钟，行吗？”……

由杜修贤叙述的自己亲眼目睹的“林彪逃席”事件，再由各类作家记者据此演绎成的各种文学纪实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90 年代、21 世纪，不仅主流媒体刊登，民间报刊也刊登；党报团报、大报小报、书籍资料都纷纷刊登；我读到的有关这一事件大同小异的作品，不下上百篇，却无一人质疑，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无一人提出新的说法。新华社记者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自撰写的材料，谁能不相信，谁敢有怀疑？

现在，突然冒出了这么多质疑者，提出了这么多不同的说法，确实让人惊异，大惑不解。

提出新说的史学权威刘家驹先生，是这样描述“林彪逃席”事件的：

1971年“五一节”焰火晚会，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走到毛泽东面前敬了礼。毛泽东拍了头，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叶群上去紧紧抓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了句什么，主席用手指点了点叶群，叶群笑了，很激动。林彪站在一边没说话，走开了，到了离主席好几个位置（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侧着身纹丝不动地望着广场，大概不到个把小时，林彪突然起身离座，向我和李文普站立的地方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如厕，他到了我跟前，一挥手说，走，回去！我愣住了：烟火满天飞舞，主席还没有离位，不辞而别，好吗？小毕还用理性的口气惋惜地说：“他俩又拉开了距离。”4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见“刘家驹作客共识网谈林彪与林彪事件”，本刊z k 1 4 1 0 b——编注）

刘先生说的林彪的“不辞而别”的情节，同杜修贤的描述基本一样，虽然角度不同，但事实基本相同。但是，两位大家的描述还是有很大不同——

杜修贤说是林彪“姗姗来迟”，让人久等不到，到了以后，毛、林二人互不搭腔；而刘先生却没有说林彪迟到，林彪还向毛敬礼。叶群还向毛表示亲热，二人谈笑风生。毛、林此时关系似乎很亲热，和杜修贤的说法大相径庭。

杜修贤说林彪只坐了几分钟，让记者连镜头也拍不到；刘先生却说林彪坐了“个把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记者拍照肯定没问题。

两种说法都是大家亲身经历，都具有权威性，哪一种说法真实可信？

正在大费踌躇之时，忽见冯锡刚先生大作，“订正有关林彪的两则史料”（见本刊z k 1 4 0 9 b——编注），不仅完全推翻了杜修贤流传几十年的观点，也和刘家驹先生刚刚发出的观点大不一样。

冯锡刚先生认为，说林彪“姗姗来迟”“不辞而别”，均为杜修贤先生的“面壁虚构”，是“想当然”的编造。他通过观看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当时拍摄的纪录片，发现毛泽东和林彪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可又说“毛泽东登楼时，其他领导人未随从”，自相矛盾），虽然未和毛泽东交谈，但林彪“神情愉悦，满面笑容”。估计坐的时间确实不长，林彪和董必武均提前离席，多半是出于健康原因，林彪不可能“不辞而别”……

这三人的观点孰是孰非，孰真孰假？

愚以为，冯先生的观点多不可信，刘先生的观点半真半假，已经作古的杜修贤先生的观点比较可信。

冯先生的观点，完全产生于1971年5月后生产的电影纪录片。而这位先生却忘了一个起码常识：那时的所有新闻宣传工具，都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掌控，电影厂制作的纪录片和所有的报刊新闻一样，都要经过江青等的严格审查、把关；尤其是林彪“犯事”后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电影，对之恨之入骨的江青张春桥在审查时，不知要费多少心机！

此时的江青等人，和林彪集团已经成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敌。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背后磨刀霍霍，江青等人也操纵舆论工具对林彪狠揭猛批。有时为了麻痹对方，故意制造一些假象掩人耳目。如同在“九一三”事件前还发表林彪“努力学习毛著”的照片一样，5月的电影也完全可能故意嫁接一些“林彪紧跟，毛林融洽”镜头，以稳定人心，伺机下手。至于这镜头是今年“五一节”的，还是去年“五一节”的，还是从别处剪来的，只有江青等人知道。

冯先生拿着江青张春桥等人炮制的纪录片，来为林彪开脱，来树立林彪的正面形象，来推翻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的观点，岂不是南辕北辙？江青在地下有知，岂不要笑掉大牙！

刘家驹先生的“不辞而别”一说，和杜修贤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谓确论。但是，说林彪向毛“敬礼”，毛泽东和叶群笑谈，说林彪坐了“个把小时”，是否属实，因为没有佐证，连冯先生说的纪录片也无此景，只能“存疑”。

但我认为，杜修贤先生的观点至今是无可置疑，无法推翻的。作为新华社最具权威的摄影记者，经常给中央领导拍摄镜头，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大事件太多了。记者的天职就是准确、客观、真实，记录下这些大事件，让世人观察、感悟、品鉴，以获教益，以受启迪。他知道他出手的作品有多少人看，有多少人评，记者的良心，记者的责任，使他肯定不敢随意编造，胡乱虚构。

况且，杜修贤没有必要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来贬低林彪。林彪后来成了“罪大恶极”的罪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杜记者没有必要再虚构一些“小儿科”，来抹黑林彪。

更何况，杜记者的文章发表以后，无数人都在阅读、品鉴、传播，无数的媒体记者和作家都在摘引、改编、演绎，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却几乎无人质疑。尤其是80年代，许多参与者、当事人、知情者都还健在，杜先生的文章他们肯定都看过，当时天安门城楼上那么多记者、警卫、秘书、服务员等人也一定看过，一些健在的中央领导也一定看过。这么多人都没有发出质疑，提出反对，反倒是过了几十年后，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杜修贤先生于2014年6月15日去世）某些人却发出质疑，说杜修贤“一派谎言”，要推翻杜先生的观点，岂非咄咄怪事！

我们重新审视杜修贤的文章，发现这种文章不好编造，也不敢编造。文中那么多故事情节，那么多活动场景，那么多大人物，具体细致，生动逼真，历历在目，谁敢这样编造？

其中有杜修贤自己的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有众多现场记者的惊诧的语言描写，更有周恩来激动的讲话。这些情节谁能编造？

为了让众人释疑，在此给有门路的好事者提两条线索——

一是查看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照片，是否如杜修贤所说的“主桌全景”，林彪是否面无笑容，和毛主席并无亲切交谈景象。如果是，便可证明杜修贤此言不谬；

二是翻看当时及后来各种媒体，是否有另外现场记者和当事人对杜修贤观点的质疑，或者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没有，便可说明杜修贤此言不虚。

在没有铁的证据和权威材料来推翻杜修贤先生的观点以前，关于1971年“五一节”焰火晚会“林彪逃席事件”的描述和定性，我还是信奉杜修贤先生的观点；对刘家驹先生的观点是半信半疑；而对冯锡刚先生的观点，我是完全不信。

□ 原载《共识网》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